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2.01.008

空间理论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昭觉县 M 社区为例

勒伍阿支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体现国家对空间贫困的一种外在力量的干预,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环境,以达到使移民脱贫致富的目的。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恶劣环境搬迁到资源更丰富、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环境中,是为了实现人们生活水平的跨越。易地扶贫搬迁改变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搬迁居民对城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一体的社会空间的实践。基于空间理论视角,聚焦于微观的社区管理者、搬迁居民与空间三方面,目的是通过对 M 社区的空间再造的路径选择和居民社会适应效果的调查,分析讨论 M 社区空间重构的优缺点,并探索空间再造的路径,丰富空间再造的路径,为社区管理者提供多种空间再造路径的选择,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空间再造;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2.4; 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2)01-0046-08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ommunities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under the Space Theory: Taking M Community in Zhaojue County as an Example

LEWU Azhi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A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untry, the community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reflects the national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space poverty. It is to chang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oor people through top-down space planning,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ifting the immigrants out of poverty and become rich. The relocation from the bad environment where the barren natural resources cannot sustain the livelihood of local people to the environment with richer resources and more conducive to human development is to realize swift promotion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reloc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changes not only people's geographical spaces, but also their practice in the integrated social spaces with diversified urba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ory and focusing on the micro community managers, relocated residents and spaces, the article's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M community spac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enrich space reconstruction paths, increase choices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for community manager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reloc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space reconstruction; paths

一、研究回顾

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现阶段,

脱贫攻坚工作重心面临重大转移,由脱贫转向稳定脱贫和稳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的文化、生态、产业、人才、组织全方位振兴与易地扶贫搬迁路径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应抓住当前乡村振兴战

收稿日期:2021-12-28

基金项目:2020 年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搬迁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昭觉县沐恩社区为例(CX2021SP31)。

作者简介:勒伍阿支(1992—),女(彝族),四川昭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彝族历史文化与宗教。

略的契机,整合各种扶贫资源,使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社区和村庄的老百姓尽快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快融入”的目的。

各界学者从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角度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基于甘肃^[1-2]、湖北^[3]、广西^[4]、陕西^[5]、云南^[6]、贵州^[7]、四川^[8]等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个案调查,研究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治理方法、成效、困境与路径选择等方面的经验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是为了更好地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搬迁后续发展没有做好就会存在已经脱贫群众返贫的风险。习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在已脱贫的口中仍有近 200 万人存在返贫风险,在边缘人口中还有近 300 万存在致贫风险。因此进一步探索安置区后续可持续发展,了解返贫风险,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显得尤为重要。“巩固扶贫成果的关键在于防止返贫,而防止返贫的关键在于控制返贫风险”^[9]。返贫的原因多种多样,不尽相同。萧鸣政和张睿超认为返贫原因有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因老返贫、因懒返贫、因愚返贫、因育返贫、因教返贫、因婚返贫、因丧返贫、因赌返贫、因毒返贫几种^[9],刘玲琪将返贫风险种类分为生存艰难型、温饱不稳定型、素质低下型、环境恶劣型、天灾人祸型五种^[10],何华征和盛德荣认为返贫风险有断血型、狩猎型、失敏型、转移型、传递型五种^[11],包国宪和杨瑚则将返贫风险分为制度政策型、资源环境型、灾祸风险型、能力习惯型四种^[12]。

在控制返贫风险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是一种处于城市和乡村中间阶段的过渡性社区^[13],具有“亦城亦乡”的过渡型特征^[14],社区的发展对政策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一旦政府扶持的政策撤回,很容易出现返贫,因此“通过全面而长远的制度安排化解政策风险”^[15]尤为重要。除此之外,扩大主体参与、强化资金运转、完善土地政策^[16],拓展就业机会、促进群众交流、树立群众主体意识^[17]等在安置区后续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空间理论,对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M 社区的调查,对社区现行的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其中的优点与不足,探讨 M 社区后续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二、空间的多维变动和社会适应

空间理论在社会学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对研

究易地扶贫搬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空间理论的萌芽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的扩张造成了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分裂^[18]。继马克思之后,涂尔干、齐美尔^[19]等人也对社会空间提出一些观点和论述。基于前人对空间的研究与观点,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对空间的概念进行系统阐述,成为系统阐述空间理论概念第一人。可以说列斐伏尔是社会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列斐伏尔认为将空间看作一种普通的容器和一种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空间本体论是不正确的^[20]。在列斐伏尔理论视域中,空间并非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一种嵌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空间”^[21]。我们可以发现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是空间的社会性,即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再现性空间,将空间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并揭示了一个社会空间的生产机制。空间实践不仅是“社会空间被感知的维度”,还是“空间生产的物质层面”,更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构成物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既是这一生产的过程也是其结果,是行动者通过使用、占有、改造等手段进行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空间表征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空间,是规划师、科学家、技术统治官僚和社会工程师之类人物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对空间进行构造,这是在任何社会(或生产方式)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再现性空间是社会个体生活的真实空间,带有空间规划作用的痕迹,同时又隐藏于物理空间的形态之下,因此最能体现社会空间的真实样貌。空间的实践将空间表征与再现性空间相连接,空间实践是在空间表征指导和约束下,建构再现性空间^[21]。由上述可知,空间具有多维性,既有“物理空间”,也有“社会空间”^[22]。空间视角下的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空间再造的过程,通过改变贫困户所处的恶劣环境空间,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空间形态搬迁到更有利于贫困户自身发展的环境空间,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目的(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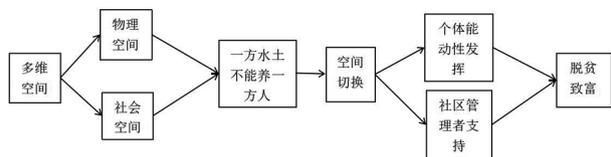


图 1 空间视角下的易地扶贫搬迁

M 社区地处昭觉县城北乡谷都村村域内,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交通便捷,社区功能基本完善,是县

城集中安置点中规模之最,总占地面积 207 亩,总建筑面积 13.34 万平方米,安置了来自全县 28 个乡镇 87 个村的 1 428 户,共 6 258 人。

(一) 物理空间的重构

物理空间是一个“可量化”“可考核”的内容,也是实现搬迁最基本的内容。主要包括居住、公共、生计三个方面的内容。高质量的物理空间的打造,可以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

1. 居住空间重构

居住空间的再造是物质性空间变迁,也是搬迁居民在搬迁过程中最先需要经历的。居住空间再造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到搬迁居民的居住体验,进而影响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高质量的居住空间的再造,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居住体验,开放的居住空间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重构社会关系网络。M 社区共有 50 栋居民楼,1 428 户,房屋是现代化风格的多层单元楼。房子大小根据居住家庭人口的数量分为五十平方米、七十五平方米、一百平方米等。社区中的居民在搬入社区之前,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要特点,散居于村落与社区集中居住大有不同。村落距离社区存在一定的距离,搬迁实现了居住空间的转变,并在社区里重构与往日截然不同的居住空间。

2. 公共空间重构

公共空间是社区多重空间的集中体现,承载着居民广泛日常活动,其质量直接反映着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公共空间包括社区的所有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交通、休闲娱乐、小区环境等。

(1) 教育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教育作为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是实现人才振兴的根本途径,因此应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在 M 社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截至 2021 年年底 M 社区及周边社区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面积有 9.26 万平方米,共预计容纳 7 600 名学生,包括一所幼儿园,周边正在建设的一所中学,两所小学,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做到了教育全覆盖,确保了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图 2)。

除此之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设了“四点半课程”和暑假大学生支教团免费补课班,意在解决由于家长文化水平低而无法辅导孩子,导致孩子学习跟不上的问题。可见当地政府结合社区特殊情况,在“扶智”工作上足了功夫。

(2) 医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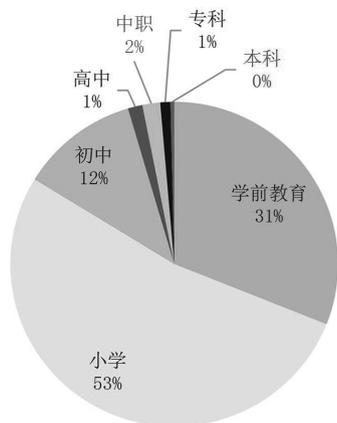


图 2 M 社区教育阶段人数结构(2565 人)

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的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23]。在 M 社区设有卫生室,距离社区三公里的县城也有多家医院,如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等,居民就医方便快捷。为防止因病返贫,对社区有重大疾病或者特殊疾病的人员建立档案,时刻关注其病情。据调查,截至 2021 年 5 月,M 社区基本医疗报销 1 371 人次 334.15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 227 人次共 26.89 万元;倾斜支付 901 人次共 48.23 万元;医疗救助 345 人次共 30.95 万元;卫生扶贫基金享受 473 人次共 12.09 万元;医疗保障共涉及 3 317 人次共 452.31 万元。马海(化名)去年因肺炎住院了半个月,才花了不到一千元。马海高兴地说:“以前老家看病不方便,现在几分钟就到医院了,费用也不高,生病都不害怕了。”医疗卫生服务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居民幸福感^[24],而且能使居民有足够的安全感。

(3) 小区环境

社区内设有小型的农贸市场、社区服务中心(包括便民服务中心、警务室、文化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功能用房)、集超市、宴会厅、食堂为一体的综合礼堂、展览馆、扶贫纪念馆各、商业街、太阳广场等,环境优美而温馨。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在社区内几乎都能解决。

3. 生计空间重构:移民“离土”的生活实践

经济整合是移民融入社区进而融入城市社会的基础^[25],居民不仅要“搬得出”,更重要的是“稳得住”和“能致富”,只要腰包“鼓起来”,村民的幸福感就会提升,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期望也会提高,从而促使居民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返贫的风险逐渐下降,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1) 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村落里,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搬迁后,居民远离土地,无法再去从事农业生产,生计主要

依靠外出务工。政府依托产业园区、东西部协作劳务输出、彝绣居家就业、技能培训、对口帮扶、支持创业、鼓励就业、设立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多渠道为居民解决就业问题。据调查,M 社区共有劳动力 2 792 人,已通过培训或者对口帮扶等途径就业 2 523 人,就业率高达 90.4%。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 年年底,彝绣工坊通过以购代捐、东西部对口帮扶等方式完成了彝绣订单 129.5 万元,居民就近到县城周边园区务工 7 890 人次,工资收入达 63.1 万元,300 余名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回原居住地从事生产农业种植养殖生产经营,以租赁、代种代养、土地入股等方式全力盘活了“三块地”资源。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随机抽查了 2 873 位 19~55 岁的居民的就业结构(图 3)。可以看出,居民搬迁后的就业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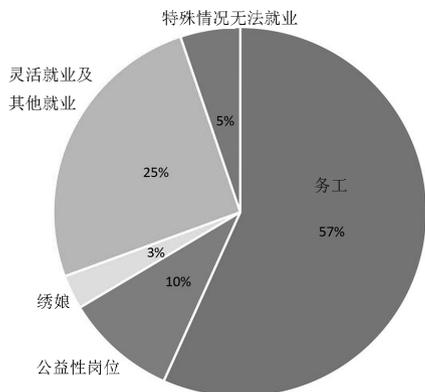


图 3 随机抽查就业结构 (2873 人)

空间和行为是互动的,空间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互动,而人们会通过这种行为和互动改变现有的空间安排。搬迁后居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伴随着居民难以适应的短暂的阵痛,但是在居民和社区管理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空间实践,从而促进居民不断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居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原有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选择外出务工,还是选择创业,都是居民再造空间的过程,也是居民的空间实践。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组织培训、鼓励创业等举措,是为了提高居民就业率,这一过程也是社区管理者的空间实践。

(2) 收支模式变动

搬迁后收支模式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搬迁户的经济融入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考察^[23]。在村落,农民依靠土地生活,粮食无需购买,自家屋前屋后的土地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瓜果蔬菜的需求,自家养的家禽家畜也基本满足肉类需求。

生活支出主要是农具、肥料、油盐等,支出数额少,长期生活在半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中。搬迁以后,生活成本增加,粮食、水电、菜等都需要花钱,消费内容丰富了,生活开支增多了,居民的生活压力也增加了,从以前的半自给自足转变到如今的完全依赖市场。图 4 是长期在社区生活的五口之家的生活成本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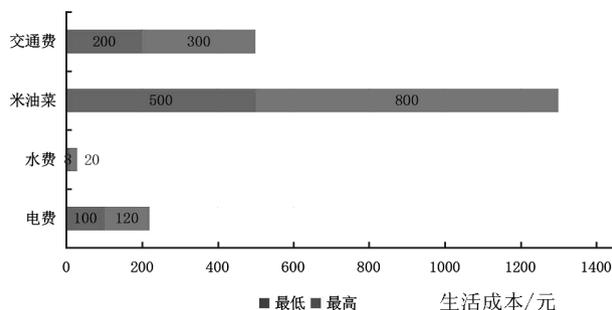


图 4 五口之家每月生活成本情况案例

搬迁后居民的收入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财产转移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三种。据调查,社区管理者在 2021 年对每一户社区居民进行了两次入户调查,发现居民的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笔者随机抽查了其中 200 户居民的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如图 5 和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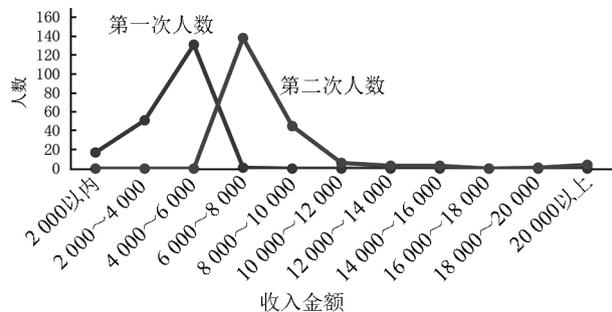


图 5 随机抽查 200 户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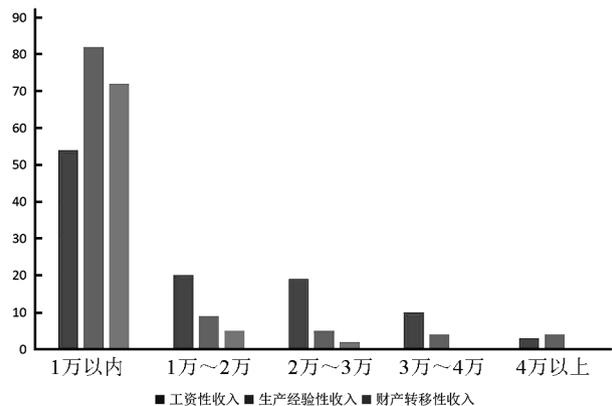


图 6 随机抽查 200 户居民的收入结构

物理空间的改变是搬迁过程中的第一步。从

以上调查可以看出, M 社区居民在经历了居住空间、公共空间和生计空间的变化后,在被社区管理者重构的物理空间中充分发挥了自主能动性,隐忍着空间变化带来的阵痛,不得不参与空间再造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适应与融入,在新的空间中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二) 社会空间的重构

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6],“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的核心”^[20],因此我们在谈论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时,不得不用空间理论来建构复杂的社会关系(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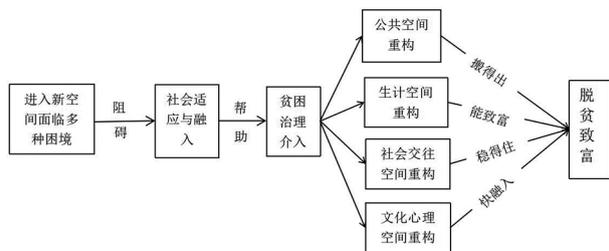


图 7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1. 社会交往空间重构

“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是一种以处理人际关系为主、强调伦理本位与和谐共处的文明”^[27]。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从熟悉里得到信任”^[28]。社交需要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的五大需求之一,认为人类需要通过与他人建立友好的关系来满足自己在心理上的归属感。M 社区居民来自不同的村落,从“熟人社会”的村落环境转到一个“半熟人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中。随着原有的社会网络的断裂,新的社交网络急需重新构建。但是好在 M 社区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其同质性表现在:首先,搬迁户都是彝族,且几乎都是昭觉县境内的彝族,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没有太大差异。其次,彝族群体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人没有谁不是亲戚”的观念。只要坐在一起背上家谱,任何人之间都总能谈成亲戚。

除了具有同质性以外,社区管理者也在通过各种途径让社区居民相互交流与沟通。如社区每栋楼有楼栋长,负责该栋楼的日常相关事宜。开展丰富的文艺活动,促进居民交流与沟通,截至 2021 年年底社区组织开展了文艺活动进社区 80 余场次。每天晚饭过后都会组织社区居民在太阳广场跳达体舞,广场舞是居民休闲娱乐的方式,有利于人们

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社区中丰富多元的娱乐休闲方式,拓展了居民的交际圈,“消解人际交往中的内卷化,提高他们的社区认同感与融入度”^[29],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

2. 文化心理空间重构

文化心理空间的重构对居民文化心理的形塑,实质上是搬迁居民与城镇文化的冲突,更深层次是乡村文化与城镇文化的冲突。文化心理空间的适应往往是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的重要适应性指标。“搬迁群体文化心理的适应是他们对迁入地形成的心理认同,最终适应当地生活并融入迁入地。”^[30]社区管理者为了使居民更快、更好地实现身份转化,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文艺活动、政策宣讲活动(包括医疗卫生、森林防火、禁毒知识、新冠防护相关政策知识等)、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卫生大扫除、家电维修、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家政服务培训)、入户开展宣传培训,并且开通了极具人性化的“一键式”呼叫服务,即居民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按呼叫按钮,社区工作人员立马提供上门服务。此外,社区设有“日间照料中心”,14 名志愿者随时为老人提供服务,包括聊天、理发、修剪指甲、量体温等。社区还设有“妇女儿童之家”,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文化心理适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搬迁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更是顺利与乡村振兴接轨的重要表现。因此在文化心理空间的建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确保顺利构建居民的文化心理空间。

三、社区空间实践与再造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移民搬迁都会对移民原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31]空间再造是一个集地理位置和社会空间于一体的重塑过程,“在空间结构中,如果某些要素发生改变,会继而导致整个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的嬗变或者变迁,使新的空间关系和空间结构得到重新建构。”^[32]无论哪一个环节没做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问题,导致社区后续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空间中,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享受的资源的不同,从而适应和改造空间的行动能力也存在差异性。搬迁居民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在适应和融入新空间具有不同步的特点。在村落里,人们依靠地缘、亲缘、血缘关系来维系,搬迁后由于空间的转变,人们面对新空间的接受需要慢慢引领与疏导。

(一) 物理空间再造的困境与路径

1. 社区管理难度大与组织建设

首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性强,没有成熟的操作模式,可借鉴的经验和案例少,社区管理难度大。其次,因 M 社区为开放小区,存在安全隐患、治安隐患风险较大,如一二楼偷盗现象易发、居民缺乏安全用电和用水知识等。

基于社区管理问题,政府应大力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强化社区服务阵地和物业服务管理,完善党员管理体系。通过安装摄像头等方式提高小区治安保障,积极引导、培训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

2. 配套设施待完善与补齐短板

首先,安置点周边产业发展缓慢,搬迁户就近就业困难。M 社区配套商业设施未入驻,对社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能力有限。落实就业的配套措施少,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其次,安置点配套设施不完善。随着社区居民生活条件改善,购买小汽车、电瓶车的居民增多,社区无公共停车位、充电桩,导致乱停乱放、私拉充电线现象严重。

针对社区设施不完善的问题,政府应积极补齐存在短板。首先,拓宽生计空间。基于扶“职”的理念,积极组织引导社团组织、知名企业及各类社会力量资源对口帮扶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吸引资金、项目落地安置点,倡议民主党派、志愿者到安置点开展社会公益、智力扶贫等社会服务活动,加快推动 M 社区配套商业设施入驻,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就业和创业扶持,全方位推荐就业。其次,完善公共空间的设施设备,让搬迁户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3. 内生动力不足与“志”“智”并扶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搬迁户住进了“新房子”,但仍然装着“旧思想”,由“散居”到“集聚”,由“农民”到“居民”,部分搬迁户不适应。加之大多数搬迁户文化水平不高,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弱。部分搬迁户的脱贫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充分,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基于扶“志”、扶“智”的理念,继续加强教育培训、技能培训。纠正群众思想观念,激发搬迁户自主创业就业愿望。加强对搬迁户的思想引导,建立定期的走访机制和宣传平台,随时发布用工信息和创业就业扶持新政策,激发劳动就业的愿望,激发居民内生动力。据调查,M 社区居民在老家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处于荒置状态。因距离太远,回老家种

地成本提高,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希望自家土地流转,仅百分之二十的居民希望回老家种植农作物。基于这种情况,社区管理者应鼓励养殖能手、致富带头人回原居住地从事生产农业种植养殖生产经营,以租赁、代种代养、土地入股等方式,确保迁出地宅基地、林地、耕地资产有效利用。

(二) 社会空间再造的困境及路径

1. 适应周期长与“主人翁”意识

乡土记忆与村落空间有机结合,在搬迁过程中形成社区边界,影响着移民的社区融入。搬迁户几乎都来自边缘山区,文化水平不高,大多数人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对社区设施设备的使用、家具家电的使用等方面比较困难,许多居民因无法在社区房子内烧火取暖,产生不满心理,部分居民对新空间的适应周期长。社会空间的变革,导致社区居民社会网络断裂,即使在 M 社区,居民的异质性表现不明显,居民相处融洽,要建立如村落里的邻里友好的强关系,仍需要进一步正确引导与关系重构,尤其是年老群体。

根据居民适应周期长的问题,应积极培养居民“主人翁”意识。在同质性的“半陌生人社会”中,基于居民共有的村落共同体记忆,在社区中通过持续不断地互动构建“熟人社会”,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日常活动中,社区管理者应积极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鼓励居民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通过社区宣传栏、社区居民大会、民主评议、推选楼栋长、组织大型活动等方式,实现“当家作主”,加快居民社区适应进程。

2. 身份转换难与强化社会认同

“新主体陌生人社区”^[33]是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结构特征。搬迁实现了居住空间的位移,但是相应的其他关于居民身份等问题尚未解决。如社保、医保等所有与搬迁户利益相关的政策仍归属原乡镇办理,导致搬迁群众频繁往返于社区与原乡镇。搬迁户一直处于漂泊于城镇与乡村之间,无法安心稳定下来,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茫与不安,难以实现对社区的归属感,从“村民”身份转化为“居民”身份遇到了障碍与困境。

基于此,政府应完善易地移民搬迁制度,尽快实现搬迁户身份转换,强化社会认同。首先,户籍是居民适应融入社区的制度性表现,是居民制度性的身份认同,而居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是其内心深处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也是其归属感的体现,更是居民最终是否适应移民社区的重要体现。政府应尽快解决居民社保、医保等相关政策转移问题,解

决搬迁户“半居民半农民”的尴尬身份,使居民成为完完全全的居民,实现居民身份转化,提升居民归属感,强化社会认同。其次,延续和重构文化伦理道德。“文化空间不仅是集中展示乡村文化的场所,也是生成各种文化事项意义的时空场所。”^[33]居民对社区主流文化的不断认同,意味着对过去社会记忆的解构。过去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与现代科学理念并非二元对立。原有的伦理道德在一定层面上有助于社区秩序的重建。因此社区应重视文化重建。通过建立德古协会、组织玛木经典学习班等途径传承传统文化,利用火把节、彝族年等节日,举办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一方面丰富了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构建了具有特色文化的、和谐的社区环境,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 特殊群体问题多与陪伴关怀

搬迁后,居住空间和生计空间分离,居民为了维持生活远走他乡,长期与家人分离,导致社区留守儿童增多,老年人没有依靠,这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老年人的幸福感都不利。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只有身心健康,才能实现更高的跨越。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的陪伴不利于儿童的成长与更好的发展。老人属于弱势群体,由于年龄较大、缺乏体力,缺乏就业竞争力。在村落里老人可以种点儿菜、养点儿家禽家畜打发时间,可是搬迁后只能闲在家。加上老人对故土有深厚的感情,无法像年轻人一样快速融入社区生活。社区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外出务工,留下没有劳动力的老人无人照顾,使得本就敏感的老人深感孤独与无助,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因此,应多加关注特殊群体生活动态。首先,对于留守儿童和特殊困难儿童方面,通过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关注等多种途径做好陪伴工作。青少年既是家庭的希望,又是社会的希望。无论是教育方面还是身心健康方面都需要关注。要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彻底斩断穷根,根本办法还在于让搬迁群众的青少年子女在搬迁后茁壮成长并接受良

好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其次,对于高龄老人方面,尤其是独居老人,需要做好时刻关怀工作,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转移老年人的注意力,组织更多的老年人参加活动,让老年人相互沟通交流,相互开导接受新事物。同时鼓励子辈加强与父辈间的沟通与陪伴,让老人不孤单,逐渐提升老人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的文化、生态、产业、人才、组织全方位振兴与易地扶贫搬迁路径不谋而合。在此背景下,M社区积极抓住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首先,社区管理者围绕空间的重构和改造进行的策略行为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包括物质空间的改变、空间知识的缔造、空间认知的心理图景等,即对外整合、引进各种扶贫资源,完善物理空间再造;对内引领、培训社区居民,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强化居民社会认同,实现社会空间合理重构。其次,搬迁居民的空间实践是在既有社会结构和时空条件中展开的,受惯习、制度与法规的制约,同时搬迁居民凭借自己的行动力能动地行动和互动,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空间后果反作用于既有结构。乡村空间向城镇空间的变迁,居住空间的重新建构,而产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动,从而影响了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搬迁居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受城镇生产生活方式、法律法规的制约,习惯性地乡村原有的日常生活方式嵌入于移民社区空间下而发生冲突,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修整、适应,或重构新的空间,表达其欲求,而重构的新空间也同样影响搬迁社区的空间结构。^[34]笔者认为实现空间的合理再造,不仅需要通过加大基层组织建设、补齐社区配套设施短板、加大对居民的技能培训力度等途径来完善物理空间再造,还需要通过培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构建强有力的社会交流平台、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等途径实现社会空间的合理再造,为社区居民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新型社区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董运来,王艳华.西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的调查[J].中国西部,2018(6):71-79.
- [2] 李晓敏.立足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浅谈古浪县脱贫攻坚的成效与后续举措[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1(9):1-2.
- [3] 刘宗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会适应研究——基于宜昌市的调查分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0(5):13-19.
- [4] 王仓,王健.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成效、经验与展望——以广西来宾市A村为例[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35(5):121-128.

- [5] 张影. 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安康市平利县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2020, 59(19): 114-117.
- [6] 许志俊, 赖庆奎, 文耀荣.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后续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云南省7个安置点的调查分析[J]. 农业与技术, 2021, 41(7): 150-153.
- [7] 孙建韦. 乡村振兴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研究——以黔南州惠水县为例[J]. 经济研究导刊, 2019(21): 21-22.
- [8] 徐杰. 四川探索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模式调查——以凉山州喜德县集中安置点做法为例[J]. 新西部, 2021(Z1): 34-36.
- [9] 萧鸣政, 张睿超. 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1, 25(2): 58-65.
- [10] 刘玲琪.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J]. 人口学刊. 2003(4).
- [11] 何华征, 盛德荣. 论农村返贫模式及其阻断机制[J]. 现代经济探讨. 2017(7).
- [12] 包国宪, 杨瑚. 我国返贫问题及其预警机制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 [13] 马良灿, 陈淇淇.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治理关系与优化[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14] 董运来, 王艳华.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入: 成效、困境与路径选择[J]. 中国西部, 2021(5): 81-90.
- [15] 周海静. 温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风险规避[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 19(3): 43-47.
- [16] 龚呈婷. 乡村振兴战略下易地扶贫搬迁: 人、地、钱的耦合机制研究——以Y市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21): 140-142.
- [17] 李志颖.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思考[J]. 社会与公益, 2020, 11(11): 30-32.
- [1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19] 齐美尔, 林荣远译.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 林荣远,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20] 徐辉. 空间秩序与空间生产——昆明桦村的空间形态变迁[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 [2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English Version). Oxford: Blackwell, 1991: 30-64.
- [22] 王寓凡, 江立华. 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基于江西省X县的调查[J]. 社会科学研究, 2020(1): 125-131.
- [23] 李林, 郭宇畅.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 [24] 徐龙顺, 李婵, 卢海阳, 宋娜娜. 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实证分析[J]. 西北人口. 2017(4).
- [25] 高新宇, 许佳君. 空间重构与移民社区融入——基于“无土安置”工程的社会学思考. 社会发展研究, 2017, 4(1).
- [26]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7]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要义[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2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9] 汪国华. 文化适应的本土化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30] 谢晓洁. 三维空间建构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城镇集中安置群体再社会化实证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6).
- [31] 赵允迪, 王俊芹. 农户农村信用社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农户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2(9): 43-51.
- [32] 丁波. 新主体陌生人社区: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1).
- [33] 李军明, 向轼. 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5): 95-103.
- [34] 陈淇淇. 社会空间变迁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研究——以兴义市Z社区移民为例[D]. 贵阳: 贵州大学, 2015.